

◇ 潘楷洙

选题四：以你选修的至少两部作品为基础，讨论作者如何营造另一个时代的特征与事件，以吸引当代读者？

文学作品是人们用以了解一个时代的方式之一，文学作品所反映的时代语境，往往在当代仍然会受到欢迎。这与作者在文学作品中各类技法的运用、人物塑造和情节建构均有不可脱离的关联。本文将结合易卜生的戏剧《玩偶之家》（玩）与莫言的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红）中的各项文体特征、人物形象与情节设计，从这些角度解答“作者如何营造另一个时代的特征与事件，以吸引当代读者”这个论题。

首先，从情节的设定来看，作家往往会用具有时代代表性意义的事件作为文学作品的情节，以此达成反映、批判当时时代的作用，并使其成为经典而受当代读者喜爱。其中，易卜生的著名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便印证了这一论点。《玩》中娜拉“砰”的一声关门，之所以成为现代戏剧文学中的经典场景，是因为它的故事本身具有跨时代的自我解放精神，这种精神在现代也是值得发扬的。易卜生身处 19 世纪末的挪威，由于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缘故，易卜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人道主义精神——“易卜生主义”。“易卜生主义”是一种批判小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虚伪的利己主义，赞同人的全部解放，自由的全面实现的一种思想，这在《玩》中有恰如其分的体现。女主角娜拉因伪造签名借钱替夫治病，却被柯洛克斯泰（柯）威胁；最终在一系列激烈的戏剧冲突后，娜拉发现自己的丈夫海尔茂（海）是一位把自己当作玩偶摆布的大男子主义者，因此摔门而去离家出走。《玩》将这一故事放诸于舞台上上演，其中也多次提及了当时挪威社会男性维权主义盛行并压迫女性自由的总体社会氛围，例如，海日常对娜拉称呼“我的小鸟儿”、“小松鼠”等等，体现了女性的物化与男性占统治地位的现实；并且一句在海口中天经地义的“男人不能为心爱的女人而牺牲自己的名誉”，便恰如其分地表现了社会上总体对女性的统摄地位。而娜拉却回应“可是千千万万女人都为男人牺牲过名誉”，以及“首先，我是一个人”这样充满个性解放意识与女性独立精神的口号与呼喊，更是让戏剧的矛盾更为激化；读者在大呼过瘾之余也会不禁为这种伟大的自由精神一振，并更加有深度地、直观地理解那个时代“男性还没有意识到，女性已经开始逐渐独立走向自由”的微妙社会背景。作家也因此达成了反映时代精神的目的。同样地，在《红高粱家族》中，作者采用了“民间故事”作为小说的题材。天高皇帝远、复杂矛盾的民间，以一种不同于十七年文学那般“英雄辈出”的方式，展现了一个不同的，充满野性魅力的民族抗日志。作者莫言身处一个充满着“英雄形象完美鲜明”的时代，却通过展现英雄的生活、战斗与心理活动的另一面，吸引读者。例如，《红》中的八路军成麻子，一开始是一个软弱无比，内心也十分麻木卑鄙的小人；这一改普通的十七年文学中正义的八路形象，更全面地展现了时代不为人知的一面。此外，《红》中所刻画的抗日战场，不是一场场宏大的战役，而是民间纷纷攘攘，充满爱恨情仇的民间抗日——没有人想到民族大义，只有“罗汉大爷被剥皮”、“二奶奶被玷污”的仇恨。这样新颖却真实的视角与情节，让莫言的《红》更加受读者的欢迎——试问谁不欢迎创新的、真实的作品呢？

除了充满现实批判意味和创新真实的情节以外，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作为其灵魂，自然也是作者展现时代背景并吸引读者的关键。《红》中的余占鳌（余）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余这个人物的构造具有多重性，不是非黑即白的英雄或恶人。余一大特点便是性格直爽粗鲁，是一个典型的“乡土中国人”。在《红》的开篇，余作为轿夫看上了“我奶奶”戴凤莲（戴），而最终杀死了戴原配的患有麻风病的丈夫，与“我奶奶”结婚。乍一看，余占鳌是个十恶不赦的大恶人。然而，就是这个恶人，成了山东高密乡的抗日英雄——阻击日军的运输车队，杀死数名军官。而这抗日杀敌的起因却是因为烧酒店的罗汉大爷被活活剥皮。余占鳌会因为养育之恩而在处刑余大牙时犹豫不决，也会因为“父亲”意外过后还健全的生育能力跪着大喊“苍天有眼”。这样一个性格极

其具有特点,行为充满矛盾,集各种土匪精神与伟大生命力为一体的余占鳌跃然纸上:他不同于人们眼中的英雄——大义凛然,嫉恶如仇,拥有完美的个人特征;余是善与恶,好与坏的综合体,他代表着在文学圈中曾尝尝被忽视的“民间”;这样真实的人物,常令读者又爱又恨,读罢又直呼过瘾的设定。那个时代乡土中国的矛盾与纷攘,都随着余占鳌表现了出来。在《玩》中,柯洛克斯泰这个人物也具有人物形象与性格之间的多面性。从娜拉的角度来看,柯洛克斯泰企图用“笨法律”威胁娜拉,诚然是一个恶人。然而,作为旁观者,我们知道柯洛克斯泰也并不是天生就邪恶——他因生活所迫,不得不威胁娜拉以抱住他赖以生存的工作。而这一切源头,来自于那套“不顾丈夫死活”的“笨法律”,以及小资产阶级中虚伪的、病态的名誉观对人精神的异化。柯洛克斯泰设定上的多元性,似的读者在感受一个真实的,综合的人物之余,思考社会环境对人性的压迫与异化,进而达成易卜生批判社会的目的。这样的批判,不仅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种种弊病,若是放之于当代仍然能起到讽刺与批评之功用;这便是为什么莫言与易卜生的人物在当今社会仍然受到欢迎的原因。

除此之外,文学作品作为一种艺术在其相应的美学领域也具有经久不衰的成就。首先,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中,作者运用了“回溯法”巧妙地表现了整部戏剧发生时间之外的起因、经过。由于戏剧有“三一律”的艺术传统,即戏剧必具发生在一个场景,一天时间与一条故事主线中,易卜生很难将《玩》的故事完整地介绍在剧本中。然而,易卜生多次利用了“回溯法”,即在戏剧台词中对过去发生事件的介绍,表达出故事潜在的起因与经过,使戏剧在遵守“三一律”之余,覆盖更广的情节线索,使叙事更完整。例如在娜拉与林丹太太的对话中间,娜拉提到了“我曾救了我丈夫的命”,以此引发了对娜拉借钱的介绍,并呼应柯对娜拉的威胁的来源。同样,柯的故事也是在与林丹太太的对话中得以展现“一个女人为了钱抛弃自己的丈夫”。通过戏剧人物间的谈话,易卜生巧妙地将故事的各个次要线索融入“一日、一地点、一故事”的戏剧结构中,达成了独特的美学效果。读者在疑惑时,戏剧对话又将故事缓缓铺开,揭开读者的迷惑,带来独特的阅读体验。在《红》中,莫言则使用了一个贯穿整部小说的意象——红高粱,来表现那个时代民间的“酒神精神”,并批判当今社会“种的退化”。在《红》中,红高粱的出现,往往伴随着杀戮,战斗,抑或是充满激情的时刻(如余与戴在高粱地里野合),或是壮烈的死人之时;在这里,这一株株红高粱,实际上充满了作者对那个“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的乡土民间那种充满野性的生命力之赞许与崇敬。并且,在莫言的最后一章,他也控诉到“家乡的红高粱已经被南方来的杂种高粱代替了”。这里,红高粱的消失表现了现代社会中人性充满生命力的一面的消失;这种“种的退化”便如同消失的红高粱一般令人捶胸顿足,失望悲哀。读者在这里若是理解了这种意象,也会不禁为之一震;而后,作者不无期许地洒下豪言:“那山冈上还有一株最纯正,最高贵的红高粱;高密东北乡的子民,你们要找到它。”又点燃了一丝希望;读者内心的酒神精神也因这一波三折的意象而涌起。这个充满豪情壮志的意象,正表明了作者所希望营造的时代特征;并通过“种的退化”最终警醒当代读者,不可为不是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与典范。

综上所述,文学作品的读者能够通过独特的情节设计,完整的人物构造,以及普世的艺术价值来营造一个时代的特征与事件,以吸引当代的各位读者。易卜生的《玩偶之家》主要是以反映社会问题的“社会问题剧”的设定以及女性独立解放的现实批判,柯洛克斯泰以及其他完整,多元的人物形象,以及在“三一律”的限制下巧妙地使用“回溯法”使叙事完整的方式,反映十九世纪的挪威以吸引当代读者。而莫言则以独特的、创新的叙事视角,主人公余占鳌矛盾的、多重的人格与性格特点,以及对“红高粱”意象的批判性使用,描写了一个有声有色的民间乡村以及乡土中国人的抗战民族志,以吸引读者。两部作品均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与独具一格的美学价值,堪称伟大的文学作品。

◇ 徐凌舟

选题三:在你选修的至少两部文学作品中,作者怎样揭示了人物在面临人生抉择时特有的深

刻矛盾心理？

《玩偶之家》和《红高粱家族》两部作品在时代环境、体裁、寓意上均有所不同。《玩偶》是易卜生写于 1879 年的社会问题剧，反映了在男权主义盛行的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家庭中女性的遭遇和社会中的人们面临的法律、道德、宗教的难题。而《红》则是莫言写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民间文学长篇小说（A-），以抗日时期的农村生活为背景，开启了对于原始生命力和自由意识的探讨。两部作品中的的一些人物都面临了来自社会传统观念与自身自由欲望、道德观念的冲突。他们与其他人物交错复杂的关系与社会环境也是外部因素对自身的冲击的体现。作者通过情节前期对矛盾的层层铺垫以及激烈的动作描写，反映了人物内心持续的挣扎，从而将这种矛盾最终的爆发和化解塑造得合情合理。（“面临人生抉择时”尚未关注到）

首先，《玩偶》的主人公娜拉就面临着夫妻关系的矛盾。她的丈夫海尔茂是男权社会的维护者，并将此观念贯彻到了家庭中对娜拉的掌控。他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社会道德、法律、宗教的奉行着，通过不加思考地遵守社会秩序为自己谋利。（最后讨论部分对柯的条件接受，怎么理解？）若说海尔茂是虚伪冷酷的资本主义社会环境的缩影，那娜拉本身崇尚自由、不盲目遵照权威的人格特征就与海尔茂形成了一次又一次的碰撞。前期的矛盾体现在娜拉本能的抗争，例如偷吃杏仁饼干，和为了救丈夫的性命而冒名借款，因为在她眼中“国家的法律跟我心里想的不一样。”同时，她也早早地意识到丈夫对自己的宠爱是源自男权主义视角下的女性的物化。她和林丹太太在对话中提及：“到我不像现在这么一这么漂亮的时候…等托伐不像现在这么喜欢看我跳舞化妆、演戏的时候。”她也意识到丈夫对自己自由的干涉，例如在她与旧时好友联络都会嫉妒。只是，在矛盾累积的前期，她由于仍旧沉浸于浪漫爱情的幻想无法脱离，甘愿忍受丈夫对自己的控制和自己内心对社会规范的怀疑，直到作者设置的第一个情节高潮爆发，随着柯洛克斯泰寄出信件和娜拉劝说失败，这封揭露娜拉“罪行”的信件终于到了海尔茂手里。对自己名誉受损的担忧撕碎了海尔茂对娜拉虚假的温情，也打破了娜拉处于对丈夫的爱所做的牺牲（包括她为保全丈夫名誉而打算自杀）。随着海尔茂称她“下贱东西”的谩骂，娜拉却“越来越冷静”。她愈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与丈夫不可调和的矛盾，自己对丈夫的真情所换来的虚假冷酷，以及自己作为一个玩偶在家庭中价值的丧失。当夫妻矛盾清晰地暴露于眼前，娜拉从内心的挣扎中迅速走出，并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出走。这是她抗争丈夫所代表的男权社会的第一步，也是她在依附于冷漠的家庭关系和对自我价值的强烈追寻中做出的取舍。人物矛盾随着戏剧冲突而明晰、激化、并被主人公的果断出走所打破。（和论题的关系在哪里？？？）

在《红》中，罗汉大爷怒砍驴蹄的自我毁灭式反抗也是由前期矛盾层层铺垫，而达成的合理举动。作为一个普通的农民本色的形象，罗汉大爷在面临日本鬼子的威胁和掠夺时有着常人都会有的懦弱胆怯。他一方面坚守着对东家的忠诚，“一次次地扑向解缰绳子的伪军”，却在日本兵用刺刀划他的头皮后无奈地屈服。他在工地下再次遭受屈辱，被监工毫无理由的毒打。这种对不公正待遇和突如其来的暴行的不解、对敌人鞭打时的忍气吞声和屈辱、和自身想要坚守的尊严与意志在他的心中纠缠拉扯，最终升腾起了一股紫红色的火苗。内心的矛盾挣扎促成了他反抗的前兆。而随着监工的苛待和对家的渴望的无限增大，这股反抗的火苗也愈升愈烈，最终随着飞起的驴蹄，外化为他怒产驴蹄的愤怒。这项自我毁灭的人生抉择将他推向了死亡。然而，他已做好了玉石俱焚的决心，他甘愿用自己的方式发泄对着头畜生所代表的愤恨，与自己和解。（本段：B+，但 C 项做的不好，是在讲述而非分析，欠缺对问题特征和艺术手法的分析。）

除了在情节设置上累积矛盾引向冲突和爆发式的化解（偏复述和讲述了），两部作品还使用丰富的动作描写，来表现人物在面临悲剧命运前的内心挣扎（B）。戴凤莲在出嫁前对自己的婚姻也有浪漫幻想，然而当她得知单扁郎是个麻风病人时，对未来仅剩的憧憬也被步步紧逼的残酷现实所打破。在象征着腐朽的残破花轿里（C），她不顾母亲的叮嘱掀开了红布，这个叛逆

不畏的动作反映了她内心希望能对这桩封建毫无人情可言的婚姻做出反抗 (C)。而她“悄悄地伸出笋尖似的脚”，挑开轿帘时，她本能地跟随自己的欲望，在死寂的花轿中，在封建的礼教下压抑的情欲打开了出口。而当她的“泪水流过面颊”时，奶奶的心中满是对既定命运的不敢和被逼无奈的接受。这些由动作揭示出的奶奶在情欲、自由和既定命运之间的矛盾 (B+C+)，为她最终突破常规，“抬起一只手臂”与轿夫在高粱地里相亲相爱 (选错了引文“不羁的心灵”) 的这一重大人生抉择做足了铺垫。她在彷徨挣扎中选择了追寻生命自由的道路。

在《玩偶》中，娜拉也曾面临过悲剧命运来临前的恐惧。(B, 但不够到位) 在海尔茂发现之前，娜拉试图让林丹太太劝说柯洛克斯泰，自己则以温习舞蹈为由拖住海尔茂。在此之前，与柯洛克斯泰的对话中，她已透露出了自杀的念头。倘若这封信真的暴露于海尔茂，娜拉似乎只有一死了之来保全丈夫的名誉。因此，在第二幕的狂舞中，娜拉内心怀有莫大的恐惧。她跳舞时的外部动作反映了她内心的矛盾和无措 (AC)。“她跳得越来越疯狂”、“头发松开”“披散在肩膀上”，自己却毫不察觉。她处于极端的恐惧，害怕冒名借债的事被丈夫知道、害怕丈夫和家庭受到波及、也害怕丈夫的反抗，更怕自己出于牺牲精神即将步入的死亡。因此，她狂舞的动作仿佛是到了“生死关头”。

两部作品中的社会环境的描写，也作为不可动摇的客观存在，为人物抛出人生抉择的难题，与人物内心价值观发生冲突，迫使人物做出取舍退让。(B+) 在《红》中，小人物孙五具有一定的负面色彩，他屈从于日本人的决定 (抉择) 为人不齿。而他的悲剧性和复杂性，以及面临的矛盾，很大程度上是由作者刻画的社会环境造成的。在日军侵略的社会背景下，日军伪军对平民的武力压制和恐怖统治使得农村人民的生存受到威胁。在这一社会因素的刺激下，孙五的道德良知被动摇，他出于求生的渴望，选择了拿起屠刀，活剥罗汉大爷。在这一过程中，他持续经历着内在良知和社会压力的冲突，这一冲突层层递进，随情节发展在内心发酵。象征着外部侵略和暴力统治的日军胁迫他：“剥不好就让狼狗开了你的膛”，这令他无比恐惧，“喏喏连声，眼皮紧急眨动”。(需点出艺术技巧) 在剥皮前，他出于愧疚地对罗汉大爷说，“大哥，兄弟没法子…”，体现了他内心尚存的良知，只是在对死亡的恐惧下被消磨殆尽。他最终扔下刀子“跪在地上，嚎啕大哭”。这是对自己懦弱无能的发泄，对同类相残的恐惧和悔恨，以及诸多矛盾心理的纠缠。他最终发疯的结局也是对社会环境的无力抗争，对内心矛盾的无力承受和无法宣泄所造成的自我毁灭。(B+A+)

《玩偶》中的柯洛克斯泰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内在矛盾也是社会环境的产物。他在戏剧开头是邪恶的狡猾的，为了恢复名誉不择手段地要挟娜拉。然而，随着情节推进，他却与娜拉的对话中透露了这么做的原因，是不近人情的法律法规。作者曾通过娜拉之口已透露出了社会法律的“不讲理”，是“笨法律”。柯洛克斯泰犯的那桩让他“身败名裂”的事是他“曾经冒险救过自己老婆的命”。他出于亲情和内心的道德标准而触犯法律，最终“在社会上到处难以站脚”。来自社会规则的诘难迫使他在矛盾中选择违背自己的良心，而威胁娜拉。而这一切矛盾行为的根源是他想在社会上重新站稳脚跟，获得资本主义社会的认可。出于对生存的渴望，并为了自己“儿子的前途”，他想要利用法律对人的压制，为自己赚取“恢复名誉”的资本。然而，他对娜拉造成了巨大的痛苦。这种对内在价值的违背仍让他感到强烈的矛盾不安，因此他会偶尔良心发现，劝阻娜拉自杀的念头，并在最后一幕与林丹太太的和解中燃起对生活的希望，要回归自己的良知，撤回信件，发“和解信”，“努力做好人”，做出了忠于自己内心良知的抉择。(“深刻矛盾”，恐怕不够深刻)

综上，两部作品通过前期情节对细微矛盾的铺垫，为高潮时人物关系矛盾的爆发以及人物最终的抉择提供了合理性，使得这些决定（如出走、怒铲驴蹄）看似过于决绝刚烈，却又入情入理。另外，两部作品还善用动作描写，作为人物矛盾心理的外化呈现。并且，作品还善于刻画社会环境，展现社会环境中的重要层面（例如外敌强权政治、不近人情的社会法律）是造成人物内心矛盾的根源。

评论：第一个分论点问题较大，详见批注。